

# 玺印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故宫博物院藏  
PDF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 玺印



主编：郑珉中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

# 玺印

## Ancient Seals

###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 主 编 ..... 郑珉中  
副主编 ..... 方 斌  
编 委 ..... 郭玉海 任万萍 王幼敏 许国平  
摄 影 ..... 刘志岗 赵 山 刘明杰
- 出 版 人 ..... 陈万雄 胡大卫  
编辑统筹 ..... 张倩仪
- 编辑顾问 ..... 吴 空  
责任编辑 ..... 徐昕宇 周祖貽  
设 计 ..... 张 毅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湾耀兴道 3 号东汇广场 8 楼
- 制 版 .....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 印 刷 .....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 版 次 .....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8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繁体版)  
©20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简体版)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 规 格 ..... 大16开(216 × 286mm) 288 面  
国际书号 ..... ISBN 978-7-5323-9470-8/J·89

版权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 总序

杨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72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新的宫殿。公元1420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后寝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历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册，计有文物

##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世襄 | 王 尧 | 李学勤 |
| 张政烺 | 金维诺 | 宿 白 |

总编委主任委员：郑欣淼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杜乃松 | 李 季 | 李文儒 |
| 李辉柄 | 余 辉 | 张忠培 |
| 邵长波 | 陈丽华 | 杨 新 |
| 杨伯达 | 单国强 | 郑珉中 |
| 郑欣淼 | 胡 锺 | 施安昌 |
| 耿宝昌 | 晋宏逵 | 徐邦达 |
| 徐启宪 | 聂崇正 | 萧燕翼 |

主 编：李文儒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徐启宪

|      |     |     |     |
|------|-----|-----|-----|
| 成 员： | 杜乃松 | 李辉柄 | 余 辉 |
|      | 邵长波 | 陈丽华 | 单国强 |
|      | 郑珉中 | 胡 锺 | 施安昌 |
|      | 秦凤京 | 郭福祥 | 聂崇正 |

总摄影：胡 锺

117万余件（套）。1947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被运往台湾，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711338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1200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1949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1994年底，计有222920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无论是中国还

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1995年8月30日于灯下

## 导言

郑珉中



玺印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凭证工具。印即图章、印章，玺亦作“𠩺”，为印的一种。秦以前，玺尊卑通用，多以金、玉、银、铜制成。据《管子·君臣上》记载：“……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秦以来，玺专指皇帝所用之印，多以玉制。汉代蔡邕《独断》载：“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制，群臣莫敢用也’。”

由于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故玺印大致可以分官玺与私玺两大类。其中，官玺又可分为官署印和官职印。私玺则更为丰富，除去日常的人名印以外，祝颂吉祥的吉语印、个性化的花押、体现个人艺术修养的闲章等也相继出现。其材质和造型也逐渐丰富，使玺印除了作为凭证工具以外，更增添了艺术性和观赏价值。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玺印数量庞大，流传有序且珍品良多。所藏自战国至清的历代官、私印章两万余件，其中既有清宫旧藏的传国宝玺等稀世珍品，也有博物院成立以来收进的诸多名家的珍藏，如吴式芬的“双虞壶斋”藏印；陈介祺的“万印楼”藏印；陈宝琛的“澄秋馆”藏印；陈汉第的“伏庐”藏印；以及徐茂斋、黄浚等人的收藏等等。以其系统性和完整性，故宫博物院遂成为全国古印之渊薮，数十年来，凡有关古玺印研究、介绍与重要出版，皆不能离开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足见其在玺印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

本卷自院藏玺印中选出各时代的珍品四百五十八件（套），按照时代与类别编纂成书，成为目前较完整的一部中国玺印史。这四百五十八件文物，不仅是中国玺印文化悠久历史的见证，同时也是可供研究的重要资料和足资鉴赏的艺术珍品。本文结合所录文物，就中国玺印的产

生、应用和发展，试作扼要的说明。

## 一、玺印的产生与应用

玺印始于何时，文献中未见记载，传说三皇五帝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玺印了。春秋及更早时代古墓的考古发掘中，无一方玺印出土。传世的古玺印，虽多是出土品，但出土时代很早，已无从考证其地点和时代。经科学的鉴定，尚可考证出某些玺印的国别，进而肯定其为战国所遗。由此可知，玺印的始作年代，不会早于战国。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战国时各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促进了官玺的出现和使用。战国时期，公室贵族的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废除，各国开始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任免官吏、选拔贤能。这些新兴的权贵，有的与国君没有血缘关系，有的出身卑贱，有的来自异国，必然为旧贵族轻视和排挤。要保证其权力正常行使，国君就需要赋予他们一级权力机构和行使权力的凭证，于是官署印与官职印就应运而生。《国策》中载，赵王封苏秦为武安君、授相印，派往各国游说合纵抗秦，并且成功。如果没有“赵相”这方官印来证明苏秦的地位和权力，其效果自然是不一样的。同样，魏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等人，如果没有拜相，没有国君授予的相印，其所推行的变法改革，恐怕也是难以执行的。由于玺印的作用极为重要，所以李悝在制定《法经》时规定，盗取兵符官印者将予以严惩。而在此前的文献中均未出现类似规定，这或可作为玺印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旁证。

其次，战国时期商业逐渐繁荣，市场交易增加，对个人凭证的需求加强，促进了私玺的出现。当时，民间器用由民间制造、自由交易，齐国、韩国、赵国都出现了大型商业城市，中等都邑也被称为“有市之邑”。这种各自在城市中设市贸易，较之《周易·系辞》所说的“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的商业局面，自然大不一样了。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收缴税款、产品标记与借贷关系都需用个人的凭证，在这一条件下，代表个人信用的私玺自然会应运而生。

最后，玺印的产生，有赖于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展。考古资料证实，青铜器的铸造始于夏，商周时期已能铸造出精美的食器、水器、酒器、兵器和车马器，并常铸有内容丰富的铭文。工匠在长期制模造范的过程中，已掌握了花纹印版与文字印模技术，大大提



高了青铜铸造水平。如新郑出土的大鼎腹部的盘虺纹、传世秦公簋上的铭文，都是用印模捺印成的，印痕宛然。而战国时期的玺印，其使用也是捺印在封泥之上，与使用印版、印模极类似。据此可知，玺印应是借助青铜工艺的发展而诞生的。

## 二、玺印的发展与分期

玺印自战国时期制作、使用以来，历代相承、沿用至今。在25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其形制尺度、文字书体、印文镌刻、钤印方法、印章质地等，都有很大变化，由最初的凭证工具进而跻身于书画艺术之林，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焕发出绚烂光彩的一枝艺术奇葩。为了扼要说明玺印发展的历史，今据其产生演变的特点，分为四期，即分国制作期、形制规范期、发展变化期、继承创新期来叙述。

### 1. 分国制作期

分国制作期，大体指战国阶段，即从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到秦灭六国（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的玺印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自行创制的。由于玺印是一种凭证工具，故不论哪国，其制作、性质、佩带、使用方法，都是类似的。然而此时的玺印处于始创阶段，在形体钮制、尺度大小、阴阳刻文、章法布局等方面，自然不会有统一的标准，再加上七国的文字不同，就形成了战国玺印随意性较强的特点。

#### （1）战国玺印的种类与形制

战国时期玺印从质地来看有铜、银、玉三种，现存的六千余方战国印，绝大多数为铜质，银质与玉质的极少。印文有阳文与阴文两种，阳文多与印体同铸而成，阴文除少量与阳文工艺一致外，多是在成印上凿刻的。从玺印的属性来看，主要有官印与私印两大类，官印中又有官署印与官职印之别，官署印是政权机构的凭证，官职印则是官吏身份与职权的凭证。私印中有姓名印、吉语印等，都是代表个人的凭证。其用途有所不同，姓名印庄重严肃，用于对上和对外，其中的单字与双字印，可能是不具姓氏的人名印，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与名可以不连在一起使用。其他如“敬事”、“敬上”等，则可能是官吏与士阶层处理公务时所用的私印。



玺印的形制，指的是印的整体，包括印形、钮制、尺寸与印文的布局。通常

所讲的印形，指印面钤拓出来的形状。从传世的战国玺印来看，印面形状计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矩形、由字形、中字形、桃形、叶形、上圆下方形、外方内圆形、外圆内方形、拱壁形、八方形、盾形、双圆形、三圆形、三角相聚形、四方相连形、异形相聚形等20余种，但绝大多数为方形。玺印形制的另一内容是钮式，即印钮的式样。战国时期玺印的钮式约有十一种：于平面印背的中间出半圆形穿孔小鼻者为鼻钮；印背高出，斜收成小方台，上出小鼻者为坛钮；印背分层递减而上出小鼻者为台钮；印身较厚，背斜收为平台，其上微隆处穿小孔者为覆斗钮；印背斜收到顶、其间作下阔上敛之弧形者为桥钮；印背之上作亭，穿孔于其顶者为亭钮；印背斜收集中出柱者为柱钮；印背之上作立人者为人钮；作觚者为觚钮；作辟邪者为兽钮；在扁方形体之上下或左右侧，作对穿孔者为穿带印。在这11种形式中，坛、台、覆斗、桥、亭五种与鼻钮属于一个体系，皆由鼻钮演化而成，只是印体略微增厚、上部稍有加工而已。



印的尺寸，习惯以印面与通高为据。战国玺印为七国所制，加之官私有别，故大小不一，不可胜计，即便一国之印亦是如此。如官印“大府”（图11），边长6.1至5.4厘米不等，通高11.7厘米。而私印“司马獭臣”（图80），边长1.1厘米，通高仅0.8厘米。举一反三，战国玺印的尺度大略如此。

战国玺印的刻面皆有边栏，无边栏者极少见，私印偶见双重边栏者。文字分行有二三字并列，三四字则分行并列，四字分三行并列几种形式，均有左右起止的变化。五字者，或二三字并列两行；或分三行，中间一字，左右各二字。六字者，多排两行，均各三字。总之字多增行，或每行增字而已。另有于边栏中加界格者，有一二竖道、十字、三横、卜字等界格形式，其文字顺序与无格者同。

## （2）七国玺印文字的区别

七国文字皆由西周籀篆发展而来，经各国损益与发展，在字型和笔画上略有差异。对比“侯马盟书”的手写文字，可知七国玺印文字与当时的手写体是一致的。今天可见的战国玺印文字约二千七百七十余字，可识者约一千三百余字。由于这批玺印俱系早年出土的传世品，其出土地点等鉴定要素已不可考，故只能根据官印的地名、官职等，结合文字进行考证，以定国别。经此考证，不但确定战国七雄皆有官印存世，且发现同一文字在各国的异同之处。简单说来，齐、楚、燕三国官印，多是有边栏的阴文印，齐国还有加竖格的，楚国有的加竖格

或十字格。秦国则是无边栏的阴文印。这四国官印边长一般在2.5厘米左右，齐、楚间有大逾5厘米之作。韩、赵、魏同出于晋，故其官印文字较为接近，皆为阳文，边长多为1.5厘米左右。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七国玺印虽俱系早期出土，但以六国所遗居多，独秦国罕见。这一现象，或许是因为六国先后战败灭国，其官、私玺印或随战败伏尸被掩埋于地下，或被废弃湮没所致。而秦统一天下，故其官、私玺印入土者极少。如此，或可推断，战国时期的官、私玺印，都应该是持有者生前所佩用的凭证，非死后专为殉葬而制作。



### (3) 战国玺印的艺术特点

由于玺印的制作是建立在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与琢玉技术之上，于方寸之间，铸刻少量的文字，自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故当战国之时，已创造出具有极高艺术水平的玺印作品。其文字笔势，阳文虽细如毫发，却绝无纤弱之姿，如“阳城 闲”（图84）；阴文偶有粗肥，仍不失雄劲之态，如“左司徒”（图1）。其章法布局，皆能疏密错落、虚实得体、变化多方，恣肆而不失准绳，自然而犹存法度。故能生动活泼、古趣盎然，为其后印章的发展，树立了丰富多彩的典范，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 2 · 统一规范期

统一规范期，大体是指秦（公元前221年）至南北朝时期（公元589年）。秦代实现大一统之后，玺印的制作也进入了较为规范的时期。在“书同文”的前提下，印文一律采用李斯所创小篆，并规定天子之印独称玺，又独以玉制，其余皆称印，用铜制，从此官印的形制初步统一。两汉时期的官印，在秦代基础上进一步与官阶的高下相联系，不但就官印的制作、应用、收缴、殉葬等都作出明确的制度规范，且对印章的质地、形制、大小与文字的安排，也陆续作出规定，使印章进入了统一规范化的时期。及至魏晋南北朝，虽然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影响到印章也出现了某些变化，但总体而言，其形制、规格仍未脱秦汉以来的体系。这一阶段的私印，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表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特点。

### (1) 实现大一统后的秦代玺印

秦统一之后，仅在玺印的质地与名称上，改变了战国时期自由随意的作法，突出了皇帝至尊

无上的地位，其他方面未见创新。迄今为止，秦玺未见有传世，传世的秦印也为数不多。今天能见到的秦印，不论官印、私印皆为凿刻的阴文，极少铸成之品，阳文更未出现。官印多正方形，其钮式主要仍为鼻钮，但有所发展，出现了两种新形式。一种钮略狭而厚，如“法丘左尉”之钮（图91）；另一种略宽且薄，因如瓦片，故有瓦钮之称，如“中行羞府”之钮（图89）。余则沿用坛钮、台钮、桥钮等式样，但为数甚少。察其尺度，边长约为1.8至2.4厘米左右，印身厚度约在0.3至0.6厘米之间。此时私印有长方形、方形、圆形与椭圆四种，钮式皆与战国时相仿，只有穿带印将原来扁方孔改为一个或两个并列的圆孔而已，其尺度大小基本与战国之作相似。

秦印皆作边栏界格，无边栏界格者绝少。方形印多作田字格，间有于当中加一竖，分为二格者；较小的方印也有于竖格之左或右再加一横格者。长方印多作日字格。圆印的界格除与方印相同者外，还有作人字界格者。文字在田字格中的读法，除右起顺读外，更有分上下两行作交叉读，且左右起读均可者，为其他时代所无。印文所用秦篆传为李斯所作，笔画细劲圆转，形体匀称，入印后被方形界格所拘束，日渐与手写体相脱离，虽笔画依旧细劲圆转，而形态日趋方正，渐露圭角，为汉代入印的篆书指明了方向。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秦代“印”字末笔短而下曳，为战国时遗形。

总之，秦代的印章，在战国传统基础上呈现出整齐严肃的新面貌。以小篆入印，发展鼻钮，印文交叉安排，是其主要特色。

## （2）规范化的两汉印章

西汉初期，玺印的制作沿用秦制，至汉武帝时始制定官印与官阶相应的等级制度，玺印的制作进一步规范化。王莽篡汉后，托古改制，对印制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改。但东汉恢复了西汉制度。印的制作进一步发展，入印的篆书与手写体逐渐分离，形成摹印专用的“缪篆”传于后世。

今天所见到的西汉初期的官印，皆称印，铜质、方形，均有边栏界格，尺寸大小亦如秦制，惟印体略厚。钮制除沿用鼻钮外，蛇形与鱼形钮为前代所无。印面界格文字多系铸成，故笔画粗直略胜秦代。印面分行有横与竖之别，以双竖行为多，篆文笔画起止皆圆，转折渐露方形，整齐笃厚的汉篆风格，初露端倪。私印则出现



起止都在右方的回文读法。

汉武帝时规定了官印的等级制度，诸侯王用金印驼钮，称玺；列侯用金印龟钮，称印；丞相、大将军金印龟钮，称章；匈奴单于金印驼钮，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称章；千石至四百石，用铜，鼻钮，称印；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长方形为半通印，皆百石以下之印。传世西汉中期官印，多为方形铜质，鎏金与银质者极少见。其钮制因袭鼻钮与瓦钮，但已不见蛇、鱼之形，而印名、尺度皆如汉初。废止了印面的边栏界格，其印文以铸造为多，笔画光洁、结字工整，排列均匀，具雄健浑厚之风。较少的凿刻之印，文字欹斜，笔画纤细，章法草率，乃匆匆急就之作，如“菑川侯印”（图126），应是殉葬品而非生前佩用之印。

王莽篡汉之后，对原来的印章制度作了修改，虽仍沿用金、银、铜印，但将二千石以上者改称章，二千石以下者称印。一般官印为铜质，瓦钮或龟钮。印皆作方形，铸造刻工均极细致。印文一般为五、六字，不足者皆以“印”或“之印”补足，字多者如“太师公将军司马印”（图162）等，则分多行排列。文字笔画圆中带方，粗细适度，结字端正，排列整齐，犹存西汉之风。不过也有例外，传世新莽官印中同一官职就有印、章并存的现象。如本卷所收“校尉之印章”（图172），既用“印”，又用“章”，与其制度并不相符。

新莽之后，东汉恢复了西汉的官印制度。传世东汉的官印，除一方银质印外，绝大多数为铜印。东汉官印约为2.0至2.6厘米见方，印身的厚度也有所增加，印钮主要是鼻钮和瓦钮，并有少量龟钮、驼钮、鸟钮与兽钮。鼻钮、瓦钮有两种形式，一种如西汉之制较为矮薄；另一种为东汉形制，较为高厚而穿孔则小于西汉之作。印文四字到九字皆有，其铸印篆书笔画愈益粗肥，转折方角显露，结字紧凑均匀，排列整齐，布局饱满。凿刻之印，多系不经意之作，且为数甚少。传世唯一一方银印——“琅邪相印章”（图198），铸造工艺精湛，时代特征鲜明，堪称珍品。



西汉及新莽时期的私印，绝大多数是铸成的白文印，凿刻急就之作极少，质地有金、银、鎏金、铜、玉、玛瑙、琥珀、牙、角、木等多种，但传世之印以铸铜为主，另有少量玉琢者。印形有正方、长方、圆形等，以正方形为多，尺度大小不等，约自0.8至2.4厘米之间。印钮样式较为丰富，有如战国式的鼻钮、坛钮、台钮、桥钮、覆斗钮、柱钮等，以小印为多；亦有如两汉式之鼻钮、瓦钮、龟钮、驼钮、辟

邪钮、鸟兽钮等，以大中型印为多。玉印为数不多，皆为方形，风格与西汉官印相同，皆琢磨细致，光彩晶莹。印文内容不断发展，字数逐步增多。西汉名印从二字至四字皆备，吉语印由二字至多字，肖形印有动物和车马人物等。新莽私印传世不多，变化亦不大。东汉私印内容相对丰富，有名号并列、阴阳文并用者，如“田长卿印”（图250）；有姓名之外加四灵装饰者，如“赵多”（图282）；有姓名外加鸟兽肖形者，如“张酉”（图271）；有臣、妾加名字如“臣相如”（插图1）、“妾毋放”（图255）；还有姓名之前加官衔、姓名加吉语等。其印文的排列、篆文的体势风格亦多与官印相同，字数由二字到二十字不等。在东汉私印印文中，有一种屈曲盘绕的异体篆书，有的还有鱼、鸟之形于其间，这种文字系由春秋时代吴越兵器之错金铭文发展而来，被称为“鸟虫书”，取之入印，至为精美，更丰富了汉印的艺术特点。如“缙孺妾娟”玉印（图234），无论玉质、琢磨工艺与鸟虫书的安排，都是罕见的，是汉代玉印中至精至美之物。



（插图1）

此时，在形制上，除穿带两面印外，更出现套印，母印钮式只铸龟身，子印龟钮与母印钮严密套合，形成完整龟钮，铸造工艺十分精湛。

### （3）规范化余绪的魏晋南北朝印章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因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印章传世较少。目前可确定有三国、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之作，主要是魏晋的官、私印与北魏的部分官印。

三国时期的官印皆铜质凿成，笔画稍粗，结字安排均类东汉晚期风格。赐予少数民族的官印，亦与汉代相仿。如“魏率善羌佰长”（图296），仅善字改为双言字的写法，国号改为魏字，其他无不与东汉印相同。印钮有瓦钮、龟钮、驼钮等，但做工较草率。两晋官印皆阴文凿刻，形制与字体布局皆与曹魏印同，其赐予少数民族的官印，除改国号为晋外，皆与曹魏相同。从印文来看，晋印中笔画挺直、结字方正、风格严谨者为继承前代凿印风格，羊形钮亦为前代之遗形。

十六国的官印存世较少，其形制、凿刻、篆体、布局多与晋印仿佛，惟边栏欠规整。赵国玺印之钮有以马代驼形者，如赵政权颁发的官印“亲赵侯印”（图311），即以马形为钮，为前代所无，殊为罕见。

这时期的私印，曹魏多白文凿铜，大小不一，且以魏正始石经篆入印，其大者如官印，有的带边栏，文字安排亦如汉印。两晋私印多为铸铜，龟钮、辟邪钮的二三套印开始发展，其作阳文大如官印者，如“刘龙印信”（图 329），犹有曹魏遗风。其作白文大如官印者，如“张懿印信”（图 330），则与汉印的风格相同。龟钮、辟邪钮做工细致，形象生动。套印皆铸造精致，颇见巧思。东汉的五面印，魏晋时期发展为六面印出现于私印之中。所谓“六面印”即除印面和印台四面之外，于其方形小柱钮顶面上亦刻文字之小印。如“张延寿”之印（图 331），顶端横刻“白记”，印面刻“张延寿”，四周分别刻“延寿之印”、“臣延寿”、“延寿言事”与“延寿白笺”。印文有“臣”、“言事”等内容，说明此人在朝为官，此印可在给帝王上疏言事时使用，当为实用之印无疑。

南北朝官印传世较少，私印尚未见到。南朝官印皆为凿铜阴文，印形、钮制、印文风格多与十六国之印相似。鼻钮向薄而高发展，龟钮仅具形态，细致者极少。书体出现与秦汉篆书背离的现象，笔画较为平直简单，不复有屈曲盘绕之感。北朝官印皆为凿铜白文，龟钮居多，制作较为精致。印文篆书进一步与秦汉相背离，笔画平直，全无圆转之势。



#### （4）秦汉魏晋南北朝印章的艺术特点

从以上介绍可知，秦统一后的印章特点约有四端。第一，以方形为主；第二，印文以阴文为主，由凿刻而后铸，凿并用；第三，由采用边栏界格到废止；第四，以小篆入印。此四点，遂为印章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秦印布局疏朗，风格娟秀，惟印之大小、文字顺序犹存随意性，是初入规范的现象。西汉初期仍用秦制，以铸代刻，故界格、文字两皆挺拔，与秦印迥异。武帝时加以规范，采用了回文章法，废除边栏界格，以汉篆入印，使印文或笔画圆转，布局丰满；或笔画方直，布局疏朗，无不气象舒展，庄重肃穆。至于明器中的凿印，虽然刻工潦草，章法欹斜，但为后世急就章的发展开辟了蹊径，遂形成了汉印的不同风格。新莽印文增至五六字，体势修长，笔画均匀，布局严整为其特色。东汉恢复西汉规格，但阔笔方折、间距紧密的铸印与结字方正、布局疏松的凿印，以及鸟虫书入印，阴阳文相间之作，肖形印继续发展等则为东汉的特色。魏晋之世，印文笔画方折、结字严正、上紧下松、细笔长脚的凿印与笔画圆转、结字端庄的铸印同时并存，可见其印章对两汉的继承与发展。南朝在刘宋时，印制犹存东晋风格，而布局参差，刻工潦草，蕴藏着新变化之将临。北朝则印文粗豪、笔画平直，不相连属，而结字紧凑生动自如，具雄强豪放的特色。

概言之，秦汉魏晋南北朝各时代的印章，在统一规范的原则下，依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印形较战国虽略有减少，而印文书体及其内容却有所增益，且多面印、套印的出现，更是前代所无。其端庄肃穆的气度与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面貌，都展现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 3·发展变化期

自隋唐至明清，皆可视为玺印的发展变化期，但其中又可细分为若干阶段。印章到隋唐之世发生了巨大变化，官印体积增大，且均铸成有边栏的细朱文。篆文圆转并增加屈曲效果，改变了秦汉以来传统的体式。鼻钮按比例增大，系带之余，更便于把持。官印如此变化盖起源于南齐，在敦煌发现的《杂阿毗昙心论》残卷上，钤有朱色阳文“永兴郡印”（插图2）。永兴自晋至唐皆称县，独南齐称郡，故知此印为南齐之作。其印大于南朝刘宋官印约四倍，篆文笔画细匀与边栏同，结字较松，上下笔画与边相接。隋唐官印与此印风格相同，可见南齐改制后，一脉相承以至隋唐。自此，官署印改为阳文大印，朱色钤拓于公文告示之上，自是赫然醒目、庄重严肃。但此后郡县令长及其属吏之官职印再未发现，看来官吏职衔变化与颁发印绶的制度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官署的作用被日益突出。所以《宋史·舆服志》中载：“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只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可见官署印不属于官吏个人，而是一级机构的代表，这就改变了自战国开始的官印制度，并为后世宋、元、明、清代代相承，因袭不改，惟在印形与文字风格上不断发展变化而已。



（插图2）

#### （1）形制变化的隋唐五代官印

隋、唐两个王朝虽绵延三百余年，但官印传世极少，所见皆承袭南朝朱文大印的形制，如隋代“广纳府印”（插图3），其制作规模、字形布局、铸造工艺无不与“永兴郡印”的特点相合。再如唐“中书省之印”（图333），大体未变，惟边栏稍宽，印文有粗细不等之别，结字布局较前略紧，其庄重典雅为隋印所不及。传世五代官印如“秦成阶文等第三指挥诸军都虞侯印”（图335），印略具长方形，边栏与文字俱细，行距紧凑，篆书犹存唐代遗风，是上承隋唐，下开两宋官印的重要物证。这一时期的私印均未见有实物，仅有拓



（插图3）